

「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學術研討會紀實

王慧婷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形塑」研究團隊於2015年1月30日舉行年會，本次學術研討會以「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作為中國外交史學術研討會的討論主軸。以國際秩序中各類衝突與紛爭與中國對外交涉為切入點，希望透過學術討論將微觀與宏觀的歷史關懷，藉由外交史研究呈現於世人眼前。

2010年初，一群擁有共同史學熾忱的青年學者，有感於海內外對檔案史料運用與國際關係探討趨勢所然，臺灣學者必須建構一套清楚的外交史研究理路；相較於個體戶單打獨鬥，未若以群體戰方式展開自我與他者對話。傳統外交史紮根於檔案，而其運用多國檔案對照為開展的研究特性，使學人備感外交與國際地位關係之深切，立足臺灣，放眼世界，拓展海內外對話並回應、接受挑戰，乃勢不可免；因此，幾位深感於與國際接軌之迫切與責無旁貸的研究者，本諸對外交史的熱愛，亟欲奠定以檔案為基礎的實證研究，並連結海內外青年研究者，於2010年2月4日首度在臺北東區集結，組成「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是為「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團隊前身。(註1)

該團隊首次年會係與國立政治大學人文研究中心合作，2011年1月27日舉辦「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青年學者的探討」研討會初試啼聲，並獲中心協助，將論文集於次年5月出版為《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註2)自此奠定研究群於每年年初召開年會與會後出版論文集之定式。自成立以來，組織名稱多次變易，乃因應成員研究格局而調整：「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第一次討論會後，引發學人響應，入會者亦有以清代外交政策為專業者，遂易名團隊名稱為「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群」。(註3)推展至今，團隊運作已進入第五年，在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補助下持續發展，研究

群目前以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現代中國的形塑」研究計畫下「中外關係與近現代中國形塑」研究組的姿態活躍於學界。

2015年1月30日舉行本屆年會，以「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作為中國外交史學術研討會的討論主軸。團隊近年來之努力成果，已逐漸證實中國外交的面貌之所以有其特色，是因其不只透過仿效西方，努力成為「文明國家」此一單一脈絡，而是有著處理內政與外務等各種不同面向交流的集合。故會議設計以「外交與涉外」為主題，除討論中國在正式的、官方的外交中，可能包涵的「現代化」部分，也將探討涉及世界外交模式與中國之間的調適狀況，藉此討論在官式外交之外，各國透過多元管道或型態，對其在華實際狀況的調整與因應，並以此理解近代中外關係史的多面性。由於不完全鎖定於外交史習用的上層、菁英式角度進行研究與書寫，故可借用大寫 H (History) 和小寫 h (histories) 的概念，試圖增加臺灣之外交史青年學者研究的視野及貢獻，是為所謂「大歷史」與「小歷史」。本屆年會設計「近代中國外交的大歷史與小歷史」題旨，並非只針對各篇論文議題軸線而論，亦標誌邁向新年度團隊之學術研究關懷所在。

論其規模，今年會議規模之大，共有 80 多位各界專家學者與會，實為空前。文章數量與性質上，自 2011 年以來，團隊每年皆於年初召開學術研討會，本次學術研討

會，計有 11 篇專論發表，在數量上與往年接近；2014 年的 12 篇、2013 年度的 9 篇，穩定的發表數量顯現團隊在整體的運作上已臻成熟。這 11 篇文章，依序從「雙邊關係」、「人物經驗」、「組織機構」、「周邊事務」四個面向進行深入討論。換言之，即自前揭四個面考察各類外交互動對中國產生的大、小效應，從而檢視近現代中國面對國際，如何發揮縱橫之術，化干戈為玉帛，以及解決外交問題之道。

第一場次「雙邊關係中的大、小外交史」，各以協商談判範疇分別呈現我國對朝鮮、伊朗、日本與英國在不同時期的國際關係。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尤淑君將傳統的中國秩序與東亞宗藩議題藉由探討〈「華夷之辨」與清代朝鮮的事大政策〉呈現，透過爬梳前人研究與朝鮮文獻，指出朝鮮立國之初尊明的「事大政策」，在明清易代之際發生變化，指出中國原本維繫國際秩序而「以夷變夏」為目的之天朝觀，在女真入主代興之後，引發朝鮮對中國關係以及對內部王朝不確定性的生成。直接衝擊了朝鮮對外政策，政策隨權勢轉移，本文在指出朝鮮華夷觀之辨不僅涉及華夏認同、體現中朝關係，「華夷之辨」中「宗周事明」立場之轉移，更反映出朝鮮自我文化轉向以及政治心態歸屬矛盾之處，並呈宗主國之外「小中國」藩屬的自我認同轉變暨東亞國家近代化之內在動力。

英國倫敦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陳

立樞〈一戰後中國與伊朗的關係及條約締結(1918-1921)〉，則聚焦於中國與伊朗走向國際舞台的嘗試。透過英、美、中三方檔案對照，跳脫以「伊朗—英國」雙邊關係為傳統的權勢格局，中、伊參與巴黎和會過程與兩國 1920 年代條約之締結為主軸，顯示雙方透過〈中華波斯通好條約〉簽訂，互不給予領事裁判權，宣示關係締結。伊朗對華政策上與中方的友好，國際上中、伊相互援助，政治上「中國模式」亦為伊朗所尋思；在一戰內政與外交皆受強權壓迫的兩國，企圖透過條約修訂、與美國保持友好等手段，達到擺脫他國鉗制、強化主權之目的。

以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為背景，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黃文德透過運用英國外交部檔案 FO 405，聚焦於戰時狀態下英艦官兵在基隆與日本憲警之衝突個案，討論〈1936 年日英基隆事件重探〉。衝突中日方認為英國艦隊進入國境內水域，實乃侵權；而英國水兵與當地民眾因語言隔閡和文化差異，輒起糾紛，亦使兩國協商膠著難解，最終是在日方態度軟化下解決懸案。文中指出基隆事件之發生不僅涉及日本治臺之地方行政或外事問題，更是在無限上綱將外僑、傳教士與旅人視為假想敵之「間諜熱」(Spy fever) 心態下，戰爭陰影的延長；而上述恐慌，正反映出日本國內在東亞戰爭中的深層恐懼。

第二場次「人物經驗中的大、小外交史」，由個別人物及其舉措，展開對近代中

國外交處境之觀察。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兼任助理教授呂慎華以〈袁世凱與威海衛勘界問題〉指出威海衛劃界爭議不僅為清末山東地方排外風潮之一，更是英租威海衛期間中英當地最大流血衝突，於今省視官方檔案與當事人集體記憶間的落差，顯示全案歷史記憶相當程度上無法反映出中英雙方實際紛爭與磨合。真正膠著的稅收問題與行政先後次序，顯示不僅兩國交涉人員互相齟齬、袁世凱代表「欽奉恩命」的中央，在面對地方民眾情緒之際亦難撫平其爭，事態擴張因素多重，實非過往「抗英」、「侵華」之單純歷史解釋所能囊括。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員張志雲〈中國海關的 1949：被遺忘在大陸的海關關員〉，關注制度層面以外的人事轉移，將關懷焦點自上層結構中的政治制度轉移至海關基層人員，指出華籍海關關員的選擇乃政治變化中不得不為之無奈：總稅務司梅勒始終沒有打算撤退、財政部長孔祥熙也一直支持保留上海總稅務司的決定，為了保持海關完整，關員留守員崗位，1949 年海關倉促撤退，使盡忠職守的海關關員感受到被背叛。中國海關在大歷史下所遭逢之境遇與抉擇，顯示戰亂與人禍下之個人抉擇，人物小歷史可資觀察中國海關曾試圖維持自身而展開的努力。

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蕭道中〈新中國外交初體驗：1950 年伍修權與他的紐約聯合國之行〉一文，則透過伍修權在

國際外交上的表現，理解新建權的「新中國」主導下外交走向，當民族主義色彩染上革命史觀，政治意識成為外交工作方針，然而外交經驗的斷裂，使得新一批外交官僚必須在無經驗狀況下從做中學，掌握要訣；以伍修權個人經驗為例，其身為蘇聯通的知識背景，及意識形態上親蘇反美之心態，加上中共代表團受到蘇聯行前支援、冷戰格局與韓戰等，又有中國代表權在聯合國的政治爭議，使其個人所反映的新中國外交經驗，突顯了意識形態高過實際談判的特徵；其經驗不僅反映中國反帝國主義意識形態與鬥爭論述，也強化了初期外交嘗試中對共產國家的依賴。

第三場次「組織機構中的大、小外交史」，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侯彥伯〈亞東開埠與「抵關貿易」(1876-1895)〉梳理 19 世紀末西藏對外開放通商之各類條約文獻，釐清西藏開放通商關鍵時間並界定大清帝國與英屬印度在交涉中的立場，指出前者對通商議題實占有主動性，而「抵關貿易」原則乃在協商中逐步建立。就統治論，清朝中央在西藏處理亞東關稅問題，對外揭露了政權缺口：即無法阻止「西藏僧俗政權」對亞東關稅務司的歧視，又顯明中國海關無法克服地方抵制，也反映帝國力量無法下達的實際權力結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任天豪的〈小歷史中的大外交：從創價學會在台發展看 1960 年代中華民國的外交知覺變

遷〉，則留心於宗教團體的政治性，以源自日本的創價學會在臺傳教發展為考察，揭示 1960 年代宗教活動所反映出的中、日、美諸國在冷戰格局下的戰局延伸不僅是在國際層面上，並且在國內社會活動發生效應；「高度入世化」的創價協會因有嚴密組織與活躍政治行動，成為戒嚴時期政府疑慮的團體。以上兩篇論文緊扣涉外領域中的組織與機構，勾勒出不同層次的外交發展機制。

第四場次「周邊事務中的大、小外交史」，三篇文章皆以國境問題為核心，透過周邊事務觀察中外秩序重建及其談判。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研究員許峰源〈晚近電報與南疆經營(1907-1928)〉以電報作為探討清末民初政府對南疆政府事務處理核心，透過檔案資料，廓清氣象事務經營與南疆主權維繫的百年演變。1890 年代清政府已正視南海海域經營權，並由外務部展開與日方嚴正交涉，民國建立以後，1920 年代再次重啟南疆電報架設事務，卻仍不免再起中日南海爭議；除中日關係外，英國對航行權的主張、法國對屬地海域之申明，也使得南疆經營因多重國際因素顯得複雜。

日俄戰後東三省的民務爭議爭議中，亦涉及外交問題。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林亨芬〈日俄戰後中日奉天警務交涉(1906-1907)〉透過日文檔案，以奉天警務解釋的歧異性，比較中、日兩國在東北統治問題上的交鋒與經過。從日俄開戰、議和到撤兵，可見日本方面逐步透過軍政、警務與民

政逐步控制並擴大在滿勢力；而此間中、日雙方膠著在中國對俄國 1896 年以來各種合同、條約的慣例與舊法效力間，兩肇理解不一，遂產生爭議，因此法理上始終缺乏共識；而日方總由領事處理地方民事糾紛，不願擴大交涉，使中、日在奉天警務交涉上總只能按個案處理，而不能究根本裁判管轄權做徹底規範與檢討。

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應俊豪〈愛仁輪事件與國民政府的處置對策〉，以 1927 年英國海軍潛艦砲擊海盜挾持之輪船招商局仁愛輪，致使沉船所引發的外交談判與司法調查為主軸，此時英國對華政策正值面對中國北伐格局之際，國民政府外交部對仁愛輪事件的處理，不僅反映出司法交涉，以中、英兩國外交文書參照，更可看北伐期間國民政府對「革命外交」模式的調整與轉向，以及英國尋思對國民政府與北洋當局政治態度轉移之經過。

上述 11 篇專論，從不同時期事件、不同觀察角度出發，卻圍繞著共通的軸線，關懷近代中國各種國際效應，以細微與宏觀兩種不同面向，展現外交策略與作為所建構的大、小歷史，對於近現代中國外交形塑歷程提供嚴謹、紮實詮釋。除研究發表之外，本次首開兩種類型的學術活動，包括「成員新書發表」、「專題演講」。前者係為提供成員在團隊共同產出之外的學術作品，能有向外推介之效，展現成果觀點；後者則為考量歷次年會主題，邀請可以提供不

同視角之思考的非團隊成員，舉行專題性演講以為攻錯。依此規劃，本屆年會之「成員新書發表」由團隊成員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歷史科專任教師蔡振豐首開先例，簡介其最新出版之專書《晚清外務部之研究》；「專題演講」則由專研性別史的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杜娟華，以 *International Law, Standards of Civilization and Chinese Women Oriented Social Activism: The Case of the 1898 Reforms* 為題，為年會提供與團隊所熟習之外交史研究、觀察面向全然不同的專題演講。

研究群一路歷經顛躓起伏、而漸次奠定基礎，宛如習武之人從馬步開始紮根，方得晉身武術之門一般，數年磨歷，日積月累，團隊運作以來，陣容逐次擴大：自成立伊始的 9 人開始累增，（註 4）平均每年皆有 1 至 3 位不等的新成員入會，至今團隊成員已達 25 人；（註 5）創始成員的研究成果以及學術版圖已有大幅進展，而團隊並不以此為滿足，欲精益求精，繼續深耕臺灣外交史研究的園地，並求在與同儕、與不同世代切磋中，欲繼續推廣外交史研究、更上層樓；本次年會已是團隊的第五次年度成果展示，亦將如過去一樣，期待透過學術討論凝聚臺灣的外交史研究成果、開拓與國內外各界的交流，並著力於凝聚以臺灣為核心的中國外交史研究，形塑學術特色，以待與國際對話。期待各界先進，能在團隊來年（2016）團隊擴大舉辦年會之時熱烈參與，給予外交史研

究群繼續努力的支持與指教。

【註釋】

1. 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簡介〉，《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2年），頁 xi-x。
2. 許峰源，〈國際秩序變動下的中國外交史研究〉，《國際秩序與中國外交的形塑》（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年），頁 iii。
3. 2011年入會新成員有：呂慎華（時任國立中央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張志雲（時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楊凡逸（時任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楊子震（時任日本筑波大學兼任研究員）、蔡振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蕭李居（時任國史館助修）。
4. 2010年2月創始成員有：王文隆（時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任天豪（時為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徐泮馨（年生）（時任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博士後）、許峰源（時為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陳群元（時為浙江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講師）、黃文德（時任國家圖書館編輯）、蕭道中（時任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應俊豪（時任國立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戴振豐（時任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人文中心主編，〈中華民國外交史研究群簡介〉，《多元視野下的中華民國外交》，頁 x-xiv。
5. 2015年團隊成員計有（以下按姓名筆劃排列）：尤淑君（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文隆（中國國民黨中央文化傳播委員會黨史館主任）、王慧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任天豪（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安德（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呂慎華（國立中央大學歷史所兼任助理教授）、林亨芬（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林能山（國家圖書館國際合作組編輯）、侯彥伯（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張志雲（上海交通大學歷史學系研究員）、張齊顯（國立臺中科技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許峰源（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應用服務組研究員）、陳立樵（英國倫敦皇家哈洛威大學歷史系博士）、陳冠任（劍橋大學歷史學院博士生）、陳群元（浙江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黃文德（國家圖書館特藏組編輯）、黃家廉（國立莫斯科大学歷史系廿世紀至廿十一世紀俄羅斯史組博士生）、楊凡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約聘教師）、楊子震（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蔡振豐（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歷史科專任教師）、鄭巧君（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蕭李居（國史館協修）、蕭道中（天主教輔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應俊豪（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戴振豐（維多利亞實驗高中歷史教師）。